

歷史空間

真名士未必就風流

■王彥

名士歷來備受世人關注，倘若此人性格乖僻怪異癡狂，再加之風流浪蕩玩世不恭，更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熱門人物。本來，他們依靠過人的學術造詣就已經名揚四海，何況有點風流韻事點綴其中，再被後人穿鑿附會編成一段才子佳人式的佳話，自然名聲大振風生水起。婦孺皆知的唐寅，便是最好的例證。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蘇州人，瀟灑飄逸，敏感自傲，雖有人評價他天地英靈「數百年一發，子畏得之」有些過譽，但他確有奇才，在書畫和文學上皆成就斐然，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然而，他真實的一生卻並沒傳說中的個個達達，而是命運多舛，患難不斷，坎坷跌宕。年輕時，唐寅放蕩不羈的生性便展露無遺，把大部分時間和金錢都用來縱情聲色。二十五歲時，父母、妹妹、妻子和孩子相繼病歿，連遭打擊後的他並未氣餒，而是一心仕進，想在官場上有所作為，卻在會試期間牽連科場弊案，只好回到蘇州當起職業畫家，恢復了早年及時行樂的頹廢生活。晚年的他一心向佛，也進行了嚴肅的學術論著和文學創作，但已無法轉變「別人笑我忒風流」的印象，年過五旬便英年早逝，驗證了他父親的預言：「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

人說「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此話未必適用於每一個名士。與唐寅同享「吳中四才子」和「明四家」美譽的文徵明，和唐寅就是極好的對照。文徵明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輸唐寅。單繪畫一項，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於藝術成就還是社會聲望，都在吳門畫派中居於領袖地位。不過，唐寅放蕩恣異的處世態度，五光十色的放蕩生活，與他的畫作一樣出名，甚至還為他的聲名推波助瀾。如「唐伯虎點秋香」之類的風流雅事，經歷代誤傳，經久不衰，幫他賺足風頭，使其名聲傳播深度和廣度儼然蓋過文徵明。

文徵明和唐寅的淵源頗深，有很多共通之處。二人生於同年同地，自幼交好，「共耽古學，游從甚密」。文徵明的父親文林曾教導過唐寅，並把他帶入蘇州文人社會圈，後二人同拜師沈周學畫，皆以詩書畫三絕著世。唐寅曠達隨性，而文徵明嚴謹自律，二人鮮明的個性大不相同，終究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唐寅好酒好色，而且好張揚自己的愛好，刻有「龍虎榜中



名第一，煙花隊裡醉千場」之類印章，就連繪製春宮圖也極富盛名。而文徵明從來潔身自好，不屑流俗作偽，持身嚴謹，連飲酒都給自己規定從不超過六杯。當唐寅在蘇州尋歡作樂時，相當節制拘謹的文徵明卻在家練字，以每天寫十本作為標準，而且寫字從不馬虎草率，給人回信，稍有不如意，定要改寫。寧王朱宸濠謀反，厚禮聘請二人，文徵明嚴厲拒絕，而唐寅前往，發現身陷險境後，只好裝瘋賣傻才得以脫身逃離。

當同樣在仕途上受挫時，唐寅選擇縱情酒色，放浪形骸而「漫負狂名」，文徵明並沒有使酒罵坐，而是把失落抑鬱之情細膩地傾注在作品裡。據《古今詞話》記載，文徵明「素性高雅，不喜聲妓」。有一次受唐寅之邀上畫舫聚會，當事先藏匿在船尾的兩名青樓女子現身陪酒時，文徵明「憤極，欲投水」，唐寅只好讓小艇送他上岸。

文林也瞧出他們性格上的差異，曾致函予其子文徵明：「子畏（唐寅）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兄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唐寅雖非「無成」，但文徵明確實是「遠到」。唐寅聰穎早慧，而文徵明早年驚鈍，晚年得志。唐寅年輕時僅用一年便高中解元，志在必得卻因涉科場案後憤世放縱，文徵明科舉連連落第不得一舉人，就是在唐寅去世那一年，以歲貢生的身份薦試吏部，當了三年翰林院待詔。當文徵明放棄仕途一門心思當他的職業畫家時，唐寅已經過世。唐寅因縱慾過度，只活了五十四歲，臨終前的絕筆詩仍不失率性豪宕：「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又何妨。陽間地府俱相識，只當漂流在異鄉。」與之相比，文徵明則是壽終正寢，以九十高齡在書桌前無疾而終。唐寅身後沒有嫡傳弟子，而文徵明主持吳中風雅長達三十餘年，其門生弟子眾多，家人也受其熏陶，形成代有傳人的書畫世家，使吳門畫派在明中後期風氣披靡，影響着明代繪畫的發展。

可見，一個真正有所作為的名士，並不是一定要靠風流韻事來博彩出位，吸引眼球。嚴謹的生活和創作態度，取得的藝術成就更大，影響更為深遠。然而，歷史的乖詭在於，民間往往喜歡對有桃色故事的名士激賞有加，津津樂道，對持身嚴謹的名士卻視為冷傲孤僻，容易疏忽淡忘，較少提及。這不知是藝術創作的不幸，還是社會道德風向標有誤。

古典瞬間

所謂「卿卿」

■王兆貴

《紅樓夢》中，以聰明過人、精於算計著稱的王熙鳳，結局頗為淒慘，曹雪芹用「聰明累」一曲概括了她的一生，其中，「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成為後人經常引用的經典語句。那麼，「卿卿」這一稱謂是怎麼來的呢？

在甲骨文中，「卿」字形象是兩個人面對面地用餐。《說文》將其本義解釋為「饗食」，就是享用食品的禮數。在農耕不發達的年代，溫飽是個大問題，所以有「民以食為天」的說法。吃飯這件事，也要靠禮法來約束，一天吃幾頓，一頓吃多少，甚至何時進食都有規定。除非特別犒賞，不是想怎麼吃就可以怎麼吃的。由於作為「饗食」的「卿」非同小可，延伸到生產關係和人際關係，就有了尊重的成分，演變成身份或人稱。

在我國古代，用「卿」來稱呼一個人，是有講究的，但在歷史沿革中，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時代不同，場合不同，指代的對象和範疇也有所不同。在



王熙鳳的繪畫作品之一。網上圖片

亦有可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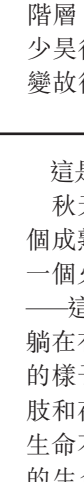
世風吹不動的梁鴻之心

■龔敏迪

很多隱士有不臣天子、不事諸侯的價值追求。然而真正像梁鴻那樣全然對富貴榮華不動心，堅持自己特立獨行存在方式的並不多。

以前民間有「熱鍋三灶柴」的說法，繼續使用別人用過的熱鍋熱灶就比較節約。但《太平御覽》說，少孤而貧窮的梁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誠灶更燃火。」他的特意另起爐灶，是因為他知道：依靠別人、沾了別人的便宜，就難以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這種另起爐灶的思想，也決定了他以後做出了「初與京邑諸友善約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的行為。

《後漢書》說，梁鴻的父親梁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封古聖人的後代，是王莽證明自己篡漢以後政權的正義性的一個手段，但他使本來無緣的梁家，意外地進入了最高貴族階層。《漢書》說：被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的還有一個梁讓，不知道是什麼變故從梁讓過渡到了梁讓？然而王莽的政



梁鴻的繪畫作品之二。網上圖片

心靈驛站

秋天，飄飛的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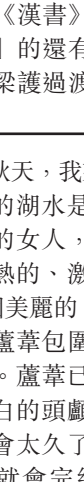
■蒲繼剛

這是秋天，我來到湖邊。

秋天的湖水是靜靜的，藍藍的，如同一個成熟的女人，風情萬種。可能是經歷了一個火熱的、激烈的夏天的緣故吧，湖水——這個美麗的、成熟的女人這時才靜靜地躺在蘆葦包圍的湖中，很溫柔、很靜謐的樣子。蘆葦已經成熟，搖動着金色的腰肢和花白的頭顱。它們知道，它們美麗的生命不會太久了，冬天來臨的時候，它們的生命就會完結，可它們現在卻那樣美麗，在每個早晨和夜晚都歡快、動人地舞蹈着。

這就是生命。老兄，再美麗的生命也逃不過死亡，是嗎？多麼精美，又是多麼殘酷，這就是生命的規則。哲學家帕斯卡爾說：「一根思想的蘆葦，多麼脆弱，多麼美麗。」他是否在把蘆葦比作生命？比作人生？是的，他是在把蘆葦比作生命、人生……

站在秋天湖的湖邊，我的心憂鬱極了。風起時，滿湖的蘆花都在飄動。夕陽的光灑在金色的蘆葦上，讓人對美麗的生命不僅產生



梁鴻的繪畫作品之一。網上圖片

開卷有益

值得港人重視的《劉蜀永香港史文集》

■陳佳榮

《劉蜀永香港史文集》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劉蜀永教授是內地旅港的香港史名家，參與和主編過《19世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史圖說》、《簡明香港史》等重要著作的編撰。本書是他的自選文集，包含卅餘篇文章，分隸於下列諸項：總論、英佔以前的香港、香港與中國革命、中英角力下的香港政治、香港經濟與文化、歷史人物、史實考訂、香港史研究動態與香港地方志、附錄。

書中各文無論史事考訂或分析評論，均呈客觀持平的態度，頗具參考價值。例如，〈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一文，以香港為個案論述西方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雙重歷史作用：〈香港：150年來政治經濟發展概況〉一文曾作為代表中國學者觀點的重要論文，於1997年發表在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性雜誌《中國季刊》上；〈香港與辛亥革命運動〉一文，系統論述了香港作為孫中山革命思想發源地、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基地、宣傳重地和籌款之地，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曾引起海內外華人傳媒的關注。書中還附有香港歷史圖片，以及與劉蜀永學術生涯有關的報刊評介、信函、簡歷、照片等，對讀者了解香港史研究狀況，以及認識香港，均有一定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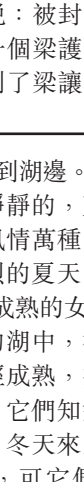
蜀永先生自中英《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簽署前後，即矢志於香港史地的研究，並馳名於香港回歸祖國時期的國內外學術論壇上。手持《劉蜀永香港史文集》，不禁浮想聯翩，因為自己與劉君從相識到建立長期友誼，亦正同此國家大事密切攸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曾共同經歷了《19世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香港史圖說》等書的編輯、出版過程，度過了無數難忘的歲月。是故故人之所以向大家推薦此書，絕非源於私交，而是出於對香港史學的密切關注和深厚感情。

毋庸諱言，部分香港學人對內地學者的香港史論著有所保留，認為政治內涵、意識形態過濃，並名之《歷史的沉重》。不過，對人、對事、對書均應持具體分析的態度，堅持史事確實、態度持平、結論客觀等標準。在這裡，未能對劉君文集各篇作甚麼具體的評述，只就自己在兩次學術會上目擊親聆蜀永教授對學術批評的態度，發表一點感想。在那些會上，有人撰文直接批評劉著，或詢及其對「歷史的沉重」批評的態度，劉教授非常平和、謙遜，一方面據理解釋，一方面感謝批評乃至反對的意見。由具有此等學者風度者所撰的篇章，即使內中難免可以商榷之處，但其學術價值、可讀程度，本身應是毋庸置疑的。

敵人在黃鴻烈教授《香港近代史》（學津書店2005年版）的〈弁言〉中有云：

「由於香港自古至今，均屬中外大國治下的一個區域，故其歷史的地方性頗重，且多非由本港人所書寫；有外國人寫的香港史，有清朝人寫的香港史，有國民黨人寫的香港史，有共產黨人寫的香港史。迄今為止，還缺少一部由香港人自己寫成的、篇幅較大的通史性香港史。本來學術研究是不能分種族、民族、國界或地域的，只要是符合客觀實際，均屬全人類的成果。惟若以香港人的立場論，如果滿意外地人為本地所撰的歷史，那就不能停留在批評的境地，而應加倍努力，認真嚴肅地編撰出一部權威的『香港人的香港史』來！」

蜀永教授早已在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和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供職，與劉智鵬博士、丁新豹博士等合力推動《香港通志》的編撰工作。「嶺南二劉一丁」所從事的不，正是「港人自譜」嗎？我們應該悉力以赴，從經費、學術、出版諸方面，對他們的大業予以充分的支持！



2007年香港史專家考察屏山鄧氏宗祠。左起為：丁新豹、蕭國健、鄧聖時、劉智鵬、劉蜀永。